

Experiment as a Way for Contemporary Art

作为一种当代艺术工作方式的“生理实验”

■ 撰文：胡斌 By Hu Bin

近些年来，无论是中国的哲学、社会学、文化学等领域，还是艺术界，“身体”都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在这里，我们讨论的是一种较之前有了新的变化的介入身体问题的视角和工作方法。他们将身体视为一个客观的、异己的、外在的环境。布莱恩·特纳曾《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中写道：“从现象学的观点看，我们可以在有一个身体（having a body）、作用于一个身体（doing a body）和是一个身体（being a body）之间作出选择。”在此，他们近似于一种“有一个身体”的感受，将之“体验为我们的环境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他们大都去除了过多个人化的、易变的感性因子，而把身体当作自己面对的一个客观对象或标本，然后以之为题材进行模拟、置换、嫁接、变异等诸多工作。

“生理实验”则指出他们的工作对象和方式是关于身体机能的严谨实验。实验一词之于艺术界，当然不会陌生。2002年的“首届广州三年展”就以“实验艺术”而非“前卫”或“先锋艺术”来归纳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某一类当代艺术。主策展人巫鸿认为：“‘实验’一词比较中性，它不带有太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成分，而且融合性很大。从内容到形态，从语言到媒介，从展览的空间到陈列方式都可以做试验。”“2009北京798艺术节”上，由鲍栋、杜曦云、刘礼宾三位年轻策展人策划的青年艺术家推荐展，又提出了“再实验”的口号。展览主题阐释这样说道：“‘实验’这个概念实际上是对‘前卫’的怀疑和修正，它怀疑前卫艺术的历史先知色彩，修正前卫艺术的群体运动模式，因此，‘实验’所强调的是艺术史发展的不可预知性和艺术实践的个体性。”

“更年轻的艺术家中的一部分依然在自觉地在各种背景下尝试着不同的艺术实验。在他们的作品中，虽然文化、社会批判与相关的问题背景依然在场，但他们更多地强化了艺术的自指性，这尤其表现在对智性与意志等主体性因素的强调上。”在那次展览上，“实验”一词再次被如此郑重地提出，它的意涵和首届广州三年展的策划旨趣有某种契合之处，当然，它更多地是鲜明地针对这几年中国当代艺术的现状而发出的一种声音。这实际上延续了几位策展人一贯的思想脉络和学术判断。那就是对庸俗社会学的简单反映论的警惕，对前卫作为身份筹码博取名利的批判，以及对于艺术文本研读的重视。他们的言说，其实也不仅仅他们，的确是直指目前中国当代艺术的某些病症。符号化、表层化，假社会批判之名博得道德认同、赢得社会声名，以耸动的姿态吸引眼球，等等，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当代艺术本体探究和实验的种种努力。所以他们一再地批评艺术创作上的社会学方式和现实主义。

此次所说的“生理实验”，首先作为一种艺术家的工作方式，当然包含上述“实验”所指的内容与形式、语言与媒介等方面的艺术实验，也隐含对简单反映论的警惕，但更主要的是，它体现出身体题材创作发生的变化，

